

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考辨

李明斌

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主要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以及晚期巴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工艺和青铜技术,而跟进的十二桥文化更是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特质,其中以彭县竹瓦街的窖藏青铜器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对它们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并阐释许多有关古蜀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青铜器窖藏的出土情况

彭县(今彭州市)东20公里的竹瓦街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青白江与蒙阳河之间的冲积扇上,南距成都市区约30公里,距新繁水观音遗址6公里,东北离广汉三星堆遗址约10公里。已有的考古发现证实,这一地区为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这里也“应是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蜀文化遗址的一部分”^①。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此先后出土了两批共40件窖藏青铜器。

1、1959年冬,兴建成汶铁路工程中,在竹瓦街北约1公里的五显庙旁铁路南侧,发现了21件青铜器^②。它们均放置于一个大陶缸内。从路基下沟壁断面观察,表土层已被去掉,盛铜器的大陶缸底部印出的痕迹距路基地表深约2米,路基沟壁、陶缸附近及上部全部填充着细黄沙土,陶缸残片的内壁和青铜器表面都有细若黑粉的水渍土。青铜戈上有下埋时有意涂抹的白膏泥。盛铜器的大陶缸残缺,为夹砂陶质,器表为红褐色,胎呈灰黑色。素面。从陶缸留下的痕迹推测,其为

小平底。底径27厘米,残高44厘米处腹径为76厘米,陶缸上部情况不明了。但根据陶缸能放置21件铜器,缸口可放两耳间距约50厘米大铜罍的情况分析,陶缸应为大口,高度可能有1米。

出土铜器计有:容(礼)器8件,其中大罍1件、小 4件、尊1件、觥2件;兵器13件,其中戈8件、戟1件、钺2件、矛和铍各1件。

2、1980年2月,当地村民在取砖瓦土时发现19件青铜器,出土于竹瓦街北约1公里的成灌铁路北侧11.5米处,东南距1959年发现的窖藏地点约25米^③。铜器出土时亦装在一大陶缸内,埋藏于一条3~4米宽的灰色土沟中,灰色土周围为黄褐色粘土。陶缸底部距现存地表约2.5米深。陶缸上部填土中杂有细小卵石,陶缸被取土时挖成了碎片,为夹砂灰褐陶,圆唇,鼓腹,小平底,上半部饰有雷纹(重菱形纹)。口径75、腹径85、底径30、通高120厘米。

出土铜器有:容(礼)器4件,均为罍,即羊头饰大罍1件、兽面饰象头罍2件、兽面小罍1件;兵器15件,其中戈10件、戟2件、钺3件,兵器出土时分别装在兽面饰象头罍中。

两次共出觥2、尊1、罍9、戈18、矛1、钺5、戟3、铍1,计40件。

二、窖藏铜器的来源和性质

1、窖藏铜器的来源

1959年清理的窖藏所出两件铜觥器形

相同,器身扁圆,侈口,束颈,腹下垂,接圈足。内底均有铭文,一为“覃父癸”,一为“牧正父己”,经徐中舒先生考证,该两器物为晚殷时期两个家族之器^④。同样铭文内容的青铜器曾分别在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竹园沟7号墓商代晚期的铜爵和陇县韦家庄1号墓商代晚期的铜尊、铜盃、铜卣上有发现。它们应各为一家之器^⑤。徐中舒先生认为竹瓦街出土的这两件铜觶系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

我们认为这两批青铜器的来源和铸造之地应具体分析,不宜混为一谈。有铭铜觶诚如徐中舒先生考证,应为蜀人参加伐纣战争所获赏赐品。而青铜尊、罍以及兵器和工具则应是蜀地本土所(仿)铸。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高超的青铜冶铸、加工工艺,给跟进的十二桥文化青铜礼(容)器、兵器和工具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将仿自中原的重器和来自中原的重器藏于一处,也是合乎情理的。

2. 窖藏铜器体现的文化性质

以土著文化为主的陶器、部分青铜工具、武器和商周文化因素很浓的青铜礼(容)器,共同构成了四川盆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十二桥文化。

竹瓦街的两处青铜器窖藏所在地为青龙村,两窖藏是青龙村遗址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博物馆对该遗址、在距铜器出土地点约1000米处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属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地层堆积(第4、5层),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泥质陶甚少。陶器多素面,有纹陶片纹饰种类主要有重菱形纹、方格纹和绳纹等。器类以小平底罐、敛口罐、敛口瓮和尖底杯为常见组合,另有少量尖底罐、尖底盏和高领罐等。它们体现出的文化面貌跟十二桥遗址的第10层及第11层接近。结合窖藏青铜器所在遗址整体情况分析,这两批窖藏青铜器的形制与花纹虽接近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

但因其为蜀地本土所铸,又具有十分独特的地方风格,因而构成了十二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四川盆地青铜时代在十二桥文化时期达到的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窖藏铜器还和羊子出土台、成都所出卜甲共同构成了十二桥文化上层建筑领域的三个要件。窖藏铜罍完全是中原的风格。冯汉骥教授认为竹瓦街窖藏铜器是蜀地仿制中原商周风格的铜器,并指出它们是西周青铜器在边缘地区的发展^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二桥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一样,其青铜礼(容)器“无论从形制或花纹,都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范畴,即使为蜀地所仿铸,亦应属商周文化系统”^⑦。另一方面,以竹瓦街铜器为主体的十二桥文化青铜礼器在花纹纹样与组合、礼器制度方面,又有自己的特色,如竹瓦街饕餮纹罍蟠龙盖上的立体蟠龙,不象中原同时期青铜器中将浅浮雕的蟠龙置于器底内侧,而是高踞于器盖之顶,俨然一个器盖把手^⑧。成都市岷江小区遗址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尊纹样也颇具特点,在腹部以雷纹作地,再在其上装饰变体夔纹,亦是蜀人仿制中原器之变异。十二桥文化青铜礼器的组合为罍、尊,尤其是列罍制度极具特色^⑨,有别于中原鼎、爵、觚、斝礼器组合制度。这些都是古蜀文明对商周文明吸收与变而化之的结果。十二桥文化在吸收、引进中原文明中的礼器时,更主要的是接受了它们具有的祭祀、盟会等宗教、礼仪功能,罍、尊组合和列罍制度客观地反映出了十二桥文化的宗教、礼仪制度。竹瓦街青铜器是十二桥文化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十二桥文化的礼制特征。

商周时期的蜀国是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统治的,是当时中原王朝的方国之一。它们间的这种关系,表现为周王赏赐蜀人青铜觶,以彰其伐纣之功^⑩;蜀人仿制中原青铜礼器;蜀人仿中原礼制而进行的祭祀活动等。四川大学宋治民教授以三星堆文化为典型代表进行分析,得出早期蜀文化受到中原

地区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和刺激的结论^①，由于盆地各支先秦考古学文化间渐进式演进的特点，这种分析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十二桥文化与中原商周文明的关系。

总之，从竹瓦街窖藏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出，十二桥文化无疑深受中原商周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在生产领域，更重要的是礼制方面，而意识形态所受到的深刻影响，更是我们将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蜀国定性为此时中原王朝之国的一个充分的证据。因而，从整体上看，十二桥文化是我国商周文明中带有个性色彩的一支地方考古学文化，它是我国商周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窖藏与铜器的年代

由于窖藏铜器，特别是铜礼器的使用时间长，其铸造与使用的年代必定早于其下埋的年代，也即窖藏的年代。而窖藏年代更能从时间上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客观情况，便于我们做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

1、窖藏的年代

1980年清理简报认为“两批铜器出土地点仅相距25米，结合其它情况判断，它们的下埋时间可能同时都在西周末期或春秋初期”，四川大学宋治民教授也认为这两座窖藏应是同一时期的^②。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由于两处窖藏均为偶然发现，没有层位关系可以利用，那么窖藏年代，即下埋的年代就当以装盛铜器的陶缸的年代为判断依据。根据1980年窖藏清理简报发表的陶缸饰拓片^③观察，该重菱形纹规整平实，布局严谨，为十二桥文化第二期重菱形纹的风格。而十二桥遗址第二期与第一期间有直接的地层层位关系和器物类型学的演变系列，表明两期间有着相对紧密的关系，那么，分别以十二桥遗址这两期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两期从年代关系上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后一期应在前一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因此，窖藏的下埋年代，也即在十二桥文化第二期的年代范围内—西周后期，下限或

可至春秋初期。

2、铜器的年代

对于1959年出土的铜器，在清理简报中王家祐先生认为它们的制作大概在殷末周初，但其下埋的时间要更晚一些。冯汉骥先生对这批铜器做了分别的研究，认为它们的时代早晚并不一致，戈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末期，矛、戟从形制和花纹分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它们大概是四川本地所铸。容器中的1件尊和两件觥是晚殷时期的器物，5件罍的形制、花纹比较接近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但因其具有十分独特的地方风格，可视为蜀地本土所铸，铸造时间在西周末期或东周初期。那么，这些铜器的下埋时间也在西周末期或东周初期^④。

对于1980年出土的铜器，简报认为它们的器形和纹饰都跟1959年窖藏铜器相类似，其时间上限不早于商末周初，并推断两批铜器的下埋时间可能同时都在西周末期或春秋初期。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注意到这两批窖藏铜器与陕西南部汉中盆地城固县铜器群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对它们也分别进行了时代的界定，认为其中尊和觥的造型以及罍的铭文、花纹具有商末周初风格，罍的造型和某些罍上装饰的回旋转尾夔纹为西周早期的典型形制与花纹，有的长援直内戈时代可早到商代，而三角形援直内戈形制略晚，属西周早期，有的甚至可能晚到西周中期^⑤。

竹瓦街铜罍极具特色，马承源先生将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的这种形制的龙纹罍年代定在西周早期^⑥。

我们根据这批铜器的来源、产生和埋藏情况(窖藏)进行年代判断，既然它们中有的源于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赏赐，有的又为蜀地本土仿制，那么，结合器物形制特点分析，它们中的大多数铸于西周早期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也即这两批窖藏铜器铸于西周早期，下埋于西周后期，下限可至春秋初期。它们的出现、使用与埋藏，基本上对应着整

个西周一代。成都平原发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考古材料相对于本区域先秦其他时期要少得多,至今仍是考古材料较为匮乏的阶段,竹瓦街铜器年代的确定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四、窖藏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四川大学宋治民教授认为这两座窖藏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⑦。这一意见对于全面分析竹瓦街窖藏铜器所包涵的内容,无疑具有指导性意义。

竹瓦街窖藏铜器下埋于十二桥文化第二期,但其铸造于西周早期,却属于十二桥文化第一期的年代范围,其铸造后即进入它们的使用期,也就是说,这两批铜器从西周早期就开始为蜀人使用了,而这时,也正是十二桥文化最为蓬勃兴盛的时期。它们的出现,是十二桥文化的人们在取代三星堆文化之后,对礼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它们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所出重器的对立物和替代物而登上古蜀历史舞台的。

三星堆遗址两座器物坑就坑本身的年代及出土陶器的年代,属于十二桥文化第一期,而十二桥文化在替代三星堆文化之时,前者的人们把代表三星堆文化的贵重器物厌胜性掩埋了起来,两个器物坑的下埋年代就是三星堆文化的下限和十二桥文化的上限^⑧。换言之,此时的成都平原正处在文化与政治、经济中心发生剧烈变革和重大转移的时期,与三星堆文化不同族属的十二桥文化亟需全面构筑属于自己的、或有自身特色的、能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政治体系,这里面就必然性地包含着对上层建筑的组建。十二桥文化在取代三星堆文化后不长的时间里,在与中原的文化交往中,就探索出了壘、尊组合和列壘制度做为自己的礼制载体,这一礼制相当程度上摒弃了三星堆文化中过分突出的“神秘”和“巫”的色彩以及对青铜尊、玉璧、玉璋、玉戈的尊崇^⑨,以极具特色的列壘制度从意识形态上与三星堆文化区别开

来,同时保持了礼器“神圣”的内核,并与羊子山土台、成都所出卜甲一起共同构成了具有十二桥文化特色的礼制体系。

五、窖藏与北方强国墓地遗存关系的透视

这两批窖藏铜器与强国墓地体现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关系密切。

十二桥文化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四川盆地的北方和东方进行着十分频繁的交往,盖因它们和四川盆地通往中原商周文明的途径有关。四川盆地往北沿嘉陵江可直达汉中盆地的汉水上游和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地区,这是四川盆地的通往中原文化中心分布区的重要通道之一。由关中原南下,越秦岭经汉中、城固到成都平原,应是当时一条商文化入川的重要路线。同时,商代蜀文化除继续通过汉中、秦岭一线和商文化交流外,还穿过三峡,与鄂、湘等地的商王朝方国互相交流^⑩。这些途径既已开通,必为后世各代所优选,历史证明,有商以降,这些线路一直都是中原文化与南方蜀国保持联系的重要通道。

由盆地北上,首先进入关中南大门—汉中盆地。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山水相连,毗邻接壤,以秦岭为北界,可将两者视为一个大的地理单元。李伯谦先生注意到这里城固出土的铜器群与竹瓦街窖藏青铜器关系密切。由汉中盆地再往北,越过秦岭,即为关中平原——中原文明的中心之一。对彭县窖藏青铜器的时代,不同的研究者虽有各自的判断,但大体上在西周,个别器物可能更早或更晚,这也符合重器窖藏的特点。竹瓦街出土的“覃父癸”觶与关中平原西缘宝鸡竹园沟的同铭爵(BZM13 6)的铭文风格和内容完全一致^⑪，“覃”族青铜器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武功县淳沱村也曾出现过^⑫。竹瓦街另一件有铭青铜觶“牧正父己”,关中平原以西,陕甘交界处的陇县韦家庄周墓中亦出有一件“牧正”铭尊^⑬,两者铭文风格相近似。竹瓦街

窖藏所出罍、觥、三角援戈跟宝鸡强国墓地的同类器形制相近,巴蜀文化中盛行的柳叶形青铜剑源于强国墓地的同类剑^⑩,无胡蜀式戈起源于盆地的北方。以上分析表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四川盆地与北方进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尽管有学者认为西周文化对四川土著文化影响的程度有限^⑪,但蜀文化中许多重要的因素均直接吸收于北方,这种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和吸纳一直贯穿着古蜀文明的始终。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于永陵

注释

①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第5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②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③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④徐中舒:《四川彭县闭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觥》,《文物》1962年第6期。

⑤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第265—266页,巴蜀书社,1991年4月。

⑥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论文集》第2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⑦宋治民:《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第77—78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2月。

⑧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论文集》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⑨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论文集》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⑩徐中舒:《四川彭县闭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觥》,《文物》1962年第6期。

⑪宋治民:《早期蜀文化与商周文明》,《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

⑫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第5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⑬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第498页图三之5。

⑭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论文集》第19—2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⑮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

⑯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237页及239页之罍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

⑰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第5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⑱王毅:《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⑲高大伦、李映福:《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⑳张玉石:《川西平原的蜀文化与商文化入川路线》,《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㉑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上册)第69页图五七之5,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㉒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

㉓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第2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

㉔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第16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㉕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第19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2月。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授业恩师、四川大学考古系宋治民教授七十寿辰,感谢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诲。)